《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2 年 第 5 期

“人的安全”与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

陈晓晨

内容提要 太平洋岛国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塑造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在理论视角上,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以“人的安全”为统领性视角,安全化理论、后殖民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等多种理论视角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在研究议题上,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注重研究本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与叙事,广泛研究“人的安全”视角下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气候安全研究最为突出。在研究力量上,分散研究和资源整合是两大特点。在研究路径上,多学科、多范式、多方法并举,研究、政策与实践相互推动。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话语叙事分析与案例研究。由此,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构成了国外国家安全研究的独特组成部分。

关键词 国家安全研究 太平洋岛国地区 人的安全 地区主义 气候安全 南太平洋大学

* 陈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20024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以传统视角看，主体由太平洋岛国（Pacific Island Countries，PICs）[①]构成的太平洋岛国地区（Pacific Islands Region，PIR）[②]并不属于国家安全研究的范畴。该地区整体位于大洋中央，“水体的阻遏”和“距离的暴政”保护了这个岛屿地区的和平。太平洋战争（1941—1945 年）结束后，该地区从未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军事冲突。大多数太平洋岛国不设军队，[③]有的国家连警察也“整天无所事事”。[④] 然而，该地区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与政治使其面临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乃至生存威胁，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海洋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衰退、资源枯竭、族群冲突、失业、社会治安、性别暴力，以及 2020 年以来爆发的严重公共卫生威胁及其次生灾害等。基里巴斯、图瓦卢等低平珊瑚礁小岛屿国家首当其冲，直接面临海平面上升导致领土丧失的现实威胁。2022 年 1 月，汤加火山爆发、海啸及救援的难度，充分暴露了这些小岛屿国家的地理孤立性与安全脆弱性。但由于国力弱小、可用资源匮乏等原因，该地区国家普遍缺乏应对这些安全威胁的能力。这些因素构成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在 21 世纪兴起的现实背景。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地区安全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首要层次，其重要性超越了国家层次上的安全研究，有多重原因：第一，太平洋岛国存在较多的共同特性，面临相似的安全威胁，产生共同的安全利益，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共性超越了不同岛国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削弱了岛国之间的排他性，强化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排他性；第二，地区主义的发展塑造了地区互动模式，特别是近年来太平洋岛国自主的地区安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区安全已经不仅是学理上的

---

① 太平洋岛国目前包括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联邦）、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图瓦卢、汤加、萨摩亚、库克群岛与纽埃，这个名单可能因新国家的创建而增加。亦称“南太平洋岛国”或“南太岛国”。近年来，学界多使用“太平洋岛国”，但“南太平洋岛国”或“南太岛国”也在广泛使用。参见汪诗明、王艳芬：《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 11 期。

② 又称“南太平洋地区”（South Pacific Region，SPR）。近年来，学界多使用“太平洋岛国地区”，但“南太平洋地区”或“南太地区”也在广泛使用。参见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界定新论：太平洋岛国何以构成地区》，《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8 期。

③ 目前，该地区仅有巴新、斐济和汤加 3 个国家有正规军，瓦努阿图有一支规模约 300 人的准军事组织“瓦努阿图机动部队”，其他国家均无军事力量。笔者曾对太平洋岛国高级军官赴华研修班学员进行过集体培训，并与他们就太平洋岛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深化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进行讨论。

④ “What Changes in the Police Ministry Are Needed?” *Samoa Observer*, March 20, 2017, p. 11. 笔者 2019 年 11 月在库克群岛实地调研时发现，该国全国只有约 100 名警察，其中绝大多数不配备枪支。

分析层次，更是实践中不断巩固的安全共同体；第三，太平洋岛国地区认同得到凝聚，形成较为一致的地区安全观与叙事；第四，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实践中，国家安全战略仍然是地区安全治理框架下的新事物。在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治理框架的核心文件——《关于地区安全的博埃宣言》(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以下简称《博埃宣言》)的要求和指导下，太平洋岛国才开始制定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所罗门群岛(2019 年)、瓦努阿图(2020 年)和帕劳(2022 年)三个国家完成了这项工作。因此，本文将地区安全研究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在研究者方面，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基础深厚，特别是澳、新、美、欧、日等研究实力雄厚，目前仍然是全球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主导力量。[①] 不过，近年来太平洋岛国机构与学者在对其本地区的研究中的话语权呈上升趋势，正在形成嵌套在更大的学术共同体中的小型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安全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逐渐形成自身特色，而且与该地区安全实践形成互动。本文将研究者限定在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机构或学者，主要考察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机构或学者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

一、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的理论视角

太平洋岛国地区面临独特而严峻的安全威胁，但是，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西方传统理论，却难以解释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尤其是本土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一方面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将该地区需求强烈的具体问题领域作为突破口，另一方面在西方传统理论以外寻找新的理论视角。

(一)“人的安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首要视角

“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最具独特性

① 陈晓晨、王海媚：《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陈晓晨研究员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4 期。

的理论视角之一。[①] 不同于主流安全研究仅将“人的安全”视为非传统安全下的一个类别或研究主题，[②]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人的安全”已经成为具有统领性的首要视角，乃至有学者将其上升为一种范式。[③]

“人的安全”概念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4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将作为个体的个人、作为集体的群体和作为整体的人类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提出“人的安全”内涵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总和，还列举了“人的安全”的外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④]

“人的安全”概念在提出后不久就进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议程。长期研究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现任南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USP）兼职教授的格雷格·弗莱（Greg Fry）是最早将“人的安全”引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并试图建立范式的学者之一。[⑤] 在此后的 20 余年里，“人的安全”逐渐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首要视角，理论与现实得到了结合：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人的安全”从根本上摒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观，强调“人的安全”的主体是太平洋岛民，而非仅限于国家，更非域外或半域外大国。

第二，在研究目标上，“人的安全”研究旨在保护太平洋岛民，使他们免受安全威胁，提升他们的安全福利，服务对象从排他性的、聚焦国家行为体扩展到涵盖整个地区，覆盖不同社会群体，最终扩展到“所有太平洋岛民的安全”。

第三，在研究主题上，“人的安全”对“不安全由何而来”给出明确回答，认为太平洋岛国地区主要面临自然环境给太平洋岛民带来的威胁，以及社会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个体带来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安

---

① 又作“人类安全”，参见余潇枫：《跨越边界：人类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未来图景——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解析》，《国家治理》2022 年第 Z1 期。

②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世界为什么不安全》（第三版·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5—246 页。

③ Vijay Naidu, “Human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rsonal Reflection,”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79-84.

④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Greg Fry, “South Pacific Security and Global Change: The New Agenda,” Working Pap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1, June 1999.

全的外延不仅超越了传统安全范畴，甚至将传统安全议题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而将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海洋、生物多样性、就业、性别，以及公共卫生等设置为安全研究的重点议题。

第四，在研究路径上，“人的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为该地区国家（包括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更好承担其对太平洋与太平洋岛民的责任义务，形成聚焦“人的安全”的安全战略与政策，解决导致“人的不安全”（human insecurity）的诸多问题，提升复原力（resilience）。①

在研究与政策的密切互动下，“人的安全”在该地区被广泛地接受，成为具有统领性的首要视角，其统领性体现在：

第一，“人的安全”研究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主流并占据话语权。越来越多机构和学者转向“人的安全”研究，其中既包括传统上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如南太平洋大学政府、发展与国际事务学院等，以及斐济学者斯蒂芬·拉图瓦（Steven Ratuva）等国际关系学者，也包括传统上从事综合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如南太平洋大学法学与社会科学学院，以及南太平洋大学社会学协调人萨拉·阿明（Sara Amin）等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

第二，“人的安全”研究衍生乃至指导该地区具体问题领域的安全研究。气候安全、海洋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性别安全等问题领域均出现了以“人的安全”为理论出发点的研究成果。

第三，“人的安全”研究成为该地区安全研究难以回避的主题。即使是从其他范式与视角出发的安全研究，包括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乃至抱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安全研究，也无法回避“人的安全”。也有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安全研究借“人的安全”名义进行。②

第四，“人的安全”研究对该地区安全战略与政策制定的实践产生影响。

---

①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ost-interventionist Paradigm,”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3, 2012, pp. 213-229.

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高级研究员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报告，称介入太平洋岛国的卫生安全是澳大利亚国防军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升级”战略下一步的角色，参见 David Brewster, “Next Step in the Step Up: The ADF's Role in Building Health Security in Pacific Island States,” April 8, 2021, https://www.aspi.org.au/report/next-step-step-adfs-role-building-health-security-pacific-island-states, 2022-07-28。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委托研究、政治咨询、观念扩散，以及直接参与地区政治过程等方式影响了该地区安全行为体的决策。[①] 在此视角影响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战略和一些国家业已制定的安全战略将“人的安全”提到战略与政策目标的高度。[②]

当然，“人的安全”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仍然是个发展中的、不断调整中的视角。有批评者认为，“人的安全”概念过于宽泛，缺乏对重点议题的聚焦。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气候安全”在太平洋岛国地区语境下愈发从“人的安全”范畴中脱离，成为独立的乃至与“人的安全”并列的研究主题。由此，这产生了“人的安全”外延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的安全”包含气候安全、防灾减灾等领域，狭义的“人的安全”仅包含人在社会领域的安全。这种概念变化主要反映了现实政策对气候安全、防灾减灾等议题的强调，反过来也影响了学界的概念界定。[③]

在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受到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人的安全”研究的“范式转变”，重新思考“人的安全”旗帜下太平洋岛国与太平洋岛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太平洋岛国作为“大海洋国家”(large ocean states)的施动性，将“太平洋岛国与太平洋岛民的复原力”置于研究的核心。[④]

（二）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其他理论视角

除了“人的安全”视角外，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还有其他理论视角。这些视角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目标都是回应太

---

① 例如，太平洋岛国资深记者、独立学者尼克·麦克莱兰(Nic Maclellan)向澳大利亚议会提交了关于气候变化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提案，阐述了太平洋岛国特别是澳大利亚近邻岛国“广义的人的安全”与澳大利亚紧密相关，参见 Nic Maclellan，“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Submission 19，” https://www.aph.gov.au/DocumentStore.ashx? id = 64dc3e39-83dd-4188-b134-5a58669cdeb4&subId=514597，2022-07-28。

② 瓦努阿图国家安全战略将“为了所有人的强有力的人的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Government of Vanuatu，“Vanuatu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ecure and Resilient，” https://www.gov.vu/images/publications/Vanuatu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2022-07-28.

③ Vijay Naidu，“Human Security in the Pacific：A Personal Reflection，” *Development Bulletin*，No.82，2021，pp.79-84.

④ Danielle Watson，et al.，“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in the Pacific：Is It Time for a Paradigm Shift，” March 15，2022，https://www.policyforum.net/rethinking-human-security-in-the-pacific/，2022-07-28.

平洋岛国与岛民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第一,安全化理论。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威胁来源于某个或某些问题通过主体间互动被建构的过程。[①] 尽管巴里·布赞(Barry Buzan)本人质疑"人的安全"概念,称其为"还原主义的、空想的观念",[②]但是,安全化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人的安全"为何能够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议题乃至主导议题,以及成为安全议题的过程。如斯蒂芬·拉图瓦所说,尽管安全化理论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它为阐明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的特定聚焦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工具。[③] 近年来,随着太平洋岛国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安全战略的制定,一些研究运用安全化理论阐释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政策制定与议程设置。其中,气候变化被定义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问题的过程,特别是从作为"人的安全"的一部分,到被定义为"对太平洋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福祉的唯一最大威胁",[④]是安全化理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案例。[⑤] 另外,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安全研究出现的"传统安全转向"也影响到太平洋岛国,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存在如何被安全化乃至"军事化",尤其关注澳大利亚政府与媒体在其中的作用。[⑥] 在此问题上,太平洋岛国学者和一些澳大利亚、新西兰学者认为,学术与政策研究本身也是安全化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府决策被持传统安全观念的人影响,太平洋岛国问题专家被"边缘化",是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紧张关系的其中一个原因。[⑦]

第二,后殖民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威胁来源于"西方中心主义"通过权力、知识与话语对"东方"的塑造。萨拉·阿明、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地区警务项目协调人丹妮尔·沃森(Danielle Watson)、南太平洋大

---

①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② Barry Buzan, "A Reductionist, Idealistic Notion That Adds Little Analytical Value," *Security Dialogue*, Vol.35, No.3, 2004, pp. 369-370.

③ Steven Ratuva, *Contested Terrain: Reconceptualis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 24.

④ Pacific Islands Forum, "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forumsec.org/2018/09/05/boe-declaration-on-regional-security/, 2022-07-28.

⑤ 一些研究认为,"气候安全"是被建构的概念,太平洋岛国地区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见 Marc Williams and Duncan McDuie-Ra,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cific: The Rol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63-86.

⑥ Michael O'Keefe, "The Militarisation of China in the Pacific: Stepping Up to a New Cold War?"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6, No.1, 2020, pp. 94-112.

⑦ Joanne Wallis, "Contradictions in Australia's Pacific Islands Discour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 No.5, 2021, pp. 487-506.

学讲师克里斯蒂安·吉拉德(Christian Girard)、南太平洋大学兼职教授克莱尔·斯拉特(Claire Slatter)等学者认为，除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外，太平洋岛国与岛民不安全的来源还有“北半球的军事主义”、经济全球化及澳、新推行的大洋洲经济一体化。因此，要脱离“全球北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才能探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强调太平洋岛国社区与国家在定义、重新定义和提升其自身安全上的施动性。[①]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学者普遍愈发反感被西方尤其是澳大利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失败国家”和“不稳定弧”(arc of instability)等标签，反对澳大利亚或其他西方国家将其当作“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或“自家牧场中的空地”(*our patch*)，认为这些叙事无助于太平洋岛民的“人的安全”；更有学者指出，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表现。[②] 作为回应，太平洋岛国学者近年来集中引用汤加学者、诗人、南太平洋大学人文学科创始人之一埃佩利·豪欧法(Epeli Hau'ofa)的“我们的岛屿之海”(our sea of islands)和“我们中间的大洋”(the ocean in us)等作为“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s)，[③]强调太平洋岛国与岛民在地区事务中的主体性，自视为广袤海洋的拥有者和守护者。[④] 基里巴斯学者、艺术家卡特琳娜·蒂瓦(Katerina Teai-

① Sara N. Amin, Christian Girard and Danielle Watson, “Security,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PICs: Aligning Priorities and Relocating Responsibility,” in Sara N. Amin, Danielle Watson, and Christian Girard, eds., *Mapp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Focus on Context, Gender and Organisation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231.

② Paul J. Carnegie and Victor T. King, “Mapping Circumstances in Oceania: Reconsidering Human Security in an Age of Globalisation,” in Sara N. Amin, et al., eds., *Mapp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Focus on Context, Gender and Organisation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15-29; Wesley Morgan, “Large Ocean States: Pacific Regionalism and Climate Security in a New Era of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East Asia*, Vol.39, No.1, 2022, pp. 48-49.

③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6, No.1, 1994, pp. 148-161; Epeli Hau'ofa, “The Ocean in U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10, No.2, 1998, pp. 392-410; “反叙事”是指由人们讲述并经历的，或直白或含蓄地反抗主导叙事的叙事，参见 Molly Andrews, “Ope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nter-Narratives and the Power to Oppose,” in Michael Bamberg and Molly Andrews, eds., *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Narrating, Resisting, Making Sen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4, p. 1。

④ Tarcisius Kabutaulaka, “Mapping the Blue Pacific in a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Graeme Smith and Terence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p. 41-69.

wa)还将太平洋岛国文学艺术的视角带入到安全研究中,支持这种“反叙事”。[①]所罗门群岛学者塔西休斯·卡布陶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和斯蒂芬·拉图瓦等进一步认为,西方对当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的负面安全解读,可以溯源至西方殖民者对美拉尼西亚岛民“卑贱的野蛮人”(ignoble savages)形象建构和对中国人所谓的“黄祸论”(yellow peril),从而对当前西方话语针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安全观进行了解构。[②]

另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有意识地将后殖民主义作为理论视角,但同样重视以话语叙事视角研究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叙事。有研究运用了叙事理论,认为叙事是“行为体将世界合理化并以特定方式有序组织起来的配置工具”,[③]构成具有“情节”(plot)的,往往由“坏人”(villain)、“受害者”(victim)、“困难”(problem)、“英雄”(hero)和“道义评判”(moral judgement)五个环节串联起来的完整故事,为特定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通过传播形成地区安全规范。[④]2017 年以来,“蓝色太平洋”(Blue Pacific)以太平洋岛国论坛决议的方式成为地区认同“新叙事”(new narrative),成为学界从话语叙事角度研究地区安全观的关注重点。

最后,地区主义既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的治理实践,又是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由于太平洋岛国整体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较晚,国家建构进程滞后,地区主义发展与国家建构进程同步进行(甚至多数国家的独立晚于主要地区组织的创立),地区层次的行为体(如地区组织)与地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家在维护安全上的薄弱环节。然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理论并

---

① Katerina Teaiwa, “Our Rising Sea of Islands: Pan-Pacific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Pacific Studies*, Vol.41, No.1, 2018, pp. 26-54; Katerina Teaiwa, “On Decoloniality: A View from Oceania,”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23, No.4, 2020, pp. 601-602.

② Tarcisius Kabutaulaka, “Re-Presenting Melanesia: Ignoble Savages and Melanesian Alter-Natives,” 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193-227; Steven Ratuva, “The Politics of Imager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Genesis of Sinophobia in Pacific Geopolitics,” *East Asia*, Vol.39, No.1, 2022, pp. 13-28.

③ Christian Bueger and Frank Gadinge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Second Edi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70.

④ 应用这套理论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环境安全治理的研究,可参见 Ashlie Denton, “Voices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Analyzing Narrativ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twork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43, 2017, pp. 62-71。

不适用于这个地区，[①]这构成了研究中的理论缺失。近年来，比较地区主义的兴起为填补这种缺失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特别是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地区主义研究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将施动性引入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研究中，主张重点关注非西方的中小国家以及“人的安全”，关注地区主义的“过程”。[②] 反过来，对太平洋岛国在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中的施动性的研究也有助于为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案例。

二、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议题

在独特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视角塑造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议题也独具特色。在层次上，地区层次的安全治理架构与叙事是研究重点，既关注太平洋岛国在地区安全治理上的施动性，又关注域外国家地缘政治对地区安全叙事的影响；在领域上，以气候安全为统领，也广泛关注“人的安全”框架下各问题领域的非传统安全议题。

（一）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与叙事

地区主义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场域。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治理架构经历了新发展：一方面，西方仍然影响力巨大且还在不断强化存在；另一方面，太平洋岛国自主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议程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与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建立发展是同步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研究直接或间接为地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反过来，地区政策制定的过程与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议题。

---

① 2006年，长期研究该地区地区主义的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根据他从事地区主义实践与研究30年的经历写道：“一大堆非常小的国家和领地，分布在辽阔的地理空间，资源和能力非常有限，很难适合有效、机制化合作的理论模型。”参见 Richard Herr, “Pacific Island Regionalism: How Firm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in Michael Powles, ed., *Pacific Futures*,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6, p. 184。

②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的应用参见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 “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 *The Round Table*, Vol.106, No.2, 2017, pp. 155-164; Helen Leslie and Kirsty Wild,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Oceania: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New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31, No.1, 2018, pp. 20-37。

2018 年，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通过的《博埃宣言》是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治理架构的核心文件之一，也是安全研究的重点议题。《博埃宣言》指出“气候变化是对太平洋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福祉的唯一最大威胁”，提出了“蓝色太平洋”框架下“扩展的安全概念”(expanded concept of security)，将“人的安全”、环境与资源安全、跨国犯罪和网络安全列为“扩展的安全概念”强调的四个重点，并在此框架下制定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太平洋岛国的安全观。以格雷格·弗莱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近年来太平洋岛国主导推动的地区主义“范式转变”，或曰“太平洋岛国新外交”，是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前因，太平洋岛国对地区气候安全的治理需求是“游戏规则改变者”。② 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太平洋中心高级研究员特丝·牛顿-凯恩(Tess Newton-Cain)等活跃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政治咨询师则通过观察议程设置过程，强调这是太平洋岛国方面主张的“人的安全”特别是气候安全与澳大利亚方面主张的良治、网络安全等安全议题相互妥协的结果。③ 当然，在南太平洋大学政府、发展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等学者看来，《博埃宣言》既是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在地区主义中主导性上升的结果，又体现了在“印太战略”压力下的妥协与调和。④

为了保障《博埃宣言》的落实执行，2019 年 8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官员委员会地区安全附属委员会(FOC Sub-Committee on Regional Security)建立，该委员会附设“太平洋安全对话”(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地区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南太平洋大学等研究机构是该机制的法定参与方。⑤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如果以欧盟或东盟为标准，太平洋岛国地区尚未出现统一的地区安全架构，也未形成巴里·布赞理论中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因为仍有多个由域外国家参与乃至主导的双多边安全机制未被太平洋岛国论坛官员委员会地区安全附属委员会及其附设的“太平洋安全对话”纳入，《蓝色太

① Pacific Islands Forum, “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② Greg Fry, *Framing the Islands: Power and Diplomatic Agency in Pacific Regionalism*,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275-303.

③ Tess Newton Cain, “Let's Hear It for the Boe,”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6, No.1, 2020, p. 33.

④ Sandra Tarte, “Reconciling Regional Security Narratives in the Pacific,” *East Asia*, Vol.39, No.1, 2022, pp. 29-43.

⑤ “2019 Pacific Islands Forum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utcomes,” July 26, 2019,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9-pacific-islands-forum-foreign-ministers-meeting-outcomes, 2022-08-09.

平洋 2050 战略》的出台延宕多时，即使出台其效力也还有待观察。[①]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以及它与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新架构产生的矛盾，是该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治理面临的不确定外部因素。应对乃至“推回”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是“印太战略”在该地区的重要目标，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宣扬“中国威胁论”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行为。[②]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岛国对被卷入大国对抗乃至冲突战争的恐惧感上升，传统安全不得不成为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不过，太平洋岛国学界并非全盘接受西方的传统安全观和现实主义逻辑，而是重点研究不同安全观叙事之间的关系。不少研究认为，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叙事的主线是太平洋岛国主张的以广义的“人的安全”为基础的“蓝色太平洋”叙事与西方的传统安全叙事尤其是“中国威胁论”叙事之间的话语冲突与调和。[③] 这些研究考察了“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叙事的复杂影响，一方面，认为前者挤占了后者的地区议程；另一方面，也看到前者也可以成为后者的机会。特别是以安娜·纳乌帕（Anna Naupa）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IFS）研究人员关于如何在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下利用“印太战略”推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太平洋岛国安全议程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较强的地区政策导向。[④]

（二）气候安全

将气候变化视为最突出的安全议题，单列“气候安全”加以重点研究，乃至

---

① Joanne Wallis, et 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rchitecture, Complex, Community, or Something El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00, No.0, 2022, pp. 1-34. 2022 年 7 月，《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得到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的认可，获得通过。

②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22-08-12.

③ Wesley Morgan, “Oceans Apart? Considering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Blue Pacific,”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6, No.1, 2020, pp. 44-64; Tarcisius Kabutaulaka, “Mapping the Blue Pacific in a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Graeme Smith and Terence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p. 41-69.

④ Anna Naupa, “Indo-Pacific Diplomacy: A View from the Pacific Islands,” *Politics and Policy*, Vol.45, No.5, 2017, pp. 902-917; Anna Naupa and Derek Brien, *Fostering Peacefu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under the 2030 Agenda*, WP/18/02, United Nations ESCAP, May 2018,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P18_02%20Fostering%20peaceful%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in%20the%20Pacific%20under%20the%202030%20Agenda.pdf, 2022-07-30.

具有一定统领性，这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研究相比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该地区气候安全研究的任务不仅是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研究进行概括总结与适当使用，并将其抽象表述为该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这是太平洋岛国独特自然环境塑造的安全需求：

首先，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与人民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其中，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威胁是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线退后、国土资源流失、海水淹没岛礁乃至全国沉入水下。即使对所罗门群岛这样陆地国土面积相对较大的太平洋岛国来说，海平面上升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国土安全问题。① 对基里巴斯和图瓦卢这样的低海拔珊瑚礁岛国来说，海平面上升更是直接的生存威胁。② 在这个意义上，主流学界所称的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在太平洋岛国这个特殊环境下交织在一起。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维护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下的领土安全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智力支持。例如，受该地区主要地区组织之一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PIDF）委托，南太平洋大学法学院研究团队起草了《太平洋气候条约》（Pacific Climate Treaty）草案，以法律形式提出了岛屿国家的“永久主权”（permanent sovereignty）主张，认为岛国对某一基线年拥有的领土和专属经济区权利具有永久性，即使将来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使得岛国的某些乃至全部领土丧失，也不影响岛国在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③ 在此推动下，划定各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外延成为《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具体措施的重中之重和首先着手的工作，作为太平洋岛国为“永久主权”的主张乃至声索进行实际准备的重要一步。④

---

① Walter Leal Filho, et 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s a Development Challenge to Small Island Stat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Solomon Island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Vol.107, 2020, pp.179-187.

② Tauisi Taupo and Llan Noy, “At the Very Edge of a Storm: The Impact of a Distant Cyclone on Atoll Islands,” *Economics of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Vol.1, No.2, 2017, pp.143-166.

③ Margaretha Wewerinke, et al.,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Regionally: The Case for a Pacific Climate Treaty*, Suva: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2016.

④ Linda Mottram, “Australia, Don’t Fail Your Neighbours,” September 10, 2018, https://www.abc.net.au/radio/programs/pm/dont-fail-your-neighbours-dame-meg-taylor-on-climate-change/10224562, 2022-07-30.

其次，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威胁。热带飓风与海啸等自然灾害是太平洋岛国地区面临另一类安全威胁。自然灾害虽然是太平洋岛民千百年来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完全由人类进入工业化以来的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但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频率与强度。有研究指出，瓦努阿图和汤加是全世界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两个国家。[①] 正因为如此，防灾减灾和气候变化两个议题在太平洋岛国的特殊环境下天然地联系在一起。[②] 南太平洋大学研究团队参与撰写的《太平洋地区可复原性发展框架：应对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管理的整合方法》提出，要加强对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两个议题的整合，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复原能力，得到 2016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波纳佩峰会的采纳。[③]

再次，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威胁。渔业安全、粮食与营养安全、水资源安全、土地资源安全等与“人的安全”高度相关，且相互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带来的风向与洋流模式的改变给海洋生物的活动带来新因素，使渔业发展受到影响；[④]珊瑚对海洋气候变化异常敏感，珊瑚的大规模死亡尤其加剧珊瑚礁岛国的国土资源流失与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粮食与其他食品供应危机；由于蒸发效应加剧，一些小型岛屿内部河流干涸，海水倒灌，海岸乃至内陆土地盐碱化，加剧了水资源安全问题、营养安全与公众健康问题；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造成大规模饥饿乃至死亡；长期缺乏蔬菜加剧了太平洋岛

---

① Anna Naupa and Derek Brien, *Fostering Peacefu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under the 2030 Agenda*, WP/18/02, United Nations ESCAP, May 2018,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P18_02%20Fostering%20peaceful%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in%20the%20Pacific%20under%20the%202030%20Agenda.pdf, 2022-07-30.

② Anand Chand and Tauisi Taupo,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Case Studies of Kiribati and Tuvalu,” in Sara N. Amin, Danielle Watson, and Christian Girard, eds., *Mapp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Focus on Context, Gender and Organisation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59-72.

③ Pacific Community (SPC),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PIF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and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USP), *Framework for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RDP), 2017 - 2030*, http://tep-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FRDP_2016_finalResilient_Dev_pacific.pdf, 2022-07-30.

④ Joeli Veitayaki, “Securing Costal Fisheries in the Pacific: Critical Resources for Food,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Security,”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56-60.

民本已严重的肥胖问题等。[①] 气候移民(包括国内移居和向国外移民)是另一个已经被纳入“人的安全”范畴的议题。[②] 气候移民的极端情况就是海平面上升致使全国被迫整体移民,虽然基里巴斯、图瓦卢等岛国政府坚称这是“最后选项”,然而,相关讨论已经在学界、政策界和媒体上开展。[③] 气候变化还影响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例如,2015 年,在连遭飓风、旱灾、粮食歉收和三次里氏 6.0 级以上地震等打击下,瓦努阿图发生政治动荡,乔·纳图曼(Joe Natuman)领导的政府倒台。也有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是所罗门群岛 2021 年“11·24”骚乱的背景之一。[④]

(三) 其他具体问题领域

在“人的安全”视角影响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涉及面广泛,领域相互交叉,除气候安全外,重点议题还包括:

海洋安全:针对包括海洋污染、渔业资源枯竭、非法捕鱼、海底资源无序开发、海洋生物多样性衰退等问题。[⑤]

粮食、食品与营养安全:针对包括粮食供应不足、供应链不畅、食品污染、营养健康不均衡(特别是长期以来蔬菜摄入严重不足导致太平洋岛民肥胖率过高)等问题。[⑥]

社会安全:针对社会秩序与治安、有组织犯罪、城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收

---

① Steven Crimp, et al., “COVID-19 and Climate: Threat Multipliers to Pacific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41-46.

② Tim Westbury, *Navigating Human Security and Climate Mobility in the Pacific Sea of Island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PUB2022/083/R, April 2022.

③ Natalie Sauer, “‘Imperialist’ Citizenship Idea Sparks Spat between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ers,”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9/02/18/imperialist-citizenship-idea-sparks-spat-australia-pacific-islanders/, 2022-07-30.

④ Harman Singh, “Trouble in Paradise with Climate Increasing the Stress: Solomon Islands,” December 24, 2021, https://www.planetarysecurityinitiative.org/news/trouble-paradise-climate-increasing-stress-solomon-islands#, 2022-07-30.

⑤ Office of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 *Blue Pacific Ocean Report: A Report by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s*, Suva: Office of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 2021.

⑥ Rita Roshni, et al., “Enhancing Leafy Foods’ Intake for Optimal Nutrition and Human Security in the South Pacific,” *The South Pacific Journal of Natural and Applied Sciences*, No.32, 2014, pp. 27-32; Nichole Georgeou, et al., “Food Security and Small Holder Farming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 Scoping Review,” *PLOS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 Vol.1, No.4, 2022, https://doi.org/ 10.1371/journal.pstr.0000009.

入不平等、失业等问题。[①]

性别安全——针对性别暴力、性别不平等、跨国人口贩卖与性剥削、女性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②]

此外，还有研究涉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去殖民化问题（特别是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岛屿政治实体的去殖民化）、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包括西巴布亚问题、布干维尔问题、马莱塔问题等）、族群冲突、经济安全等诸多问题。[③]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给太平洋岛国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安全挑战，充分暴露了地理上的孤立性和海洋性带来的安全红利（如边境防控较易、病毒传播总体较慢等）与安全弊端（防疫物资供应不畅、疫苗不足不均、对依赖旅游业和侨汇的岛国经济打击巨大、失业显著增加、性别暴力上升等），影响到“人的安全”的方方面面，成为近两年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重点议题。[④]

三、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力量与路径方法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力量与路径方法既由该地区的现实情况塑造，又与该地区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与主要议题相契合。

---

① Danielle Watson and Sinclair Dinnen, “Contextualising Policing in Melanesia: History, Adaptation and Adoption Problematised,” in Sara N. Amin, et al., eds., *Mapp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Focus on Context, Gender and Organisation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161-173; Danielle Watson, et al., “Transnational and Organised Crime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Police Capacity to Respond to the Emerging Security Threat,”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151-155.

② Melissa Bull, et al., “The Virtues of Strangers: Policing Gender Violence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olicing and Society*, Vol.29, No.2, 2019, pp. 155-170; Sharon Bhagwan Rolls and Alisia Evans, *Feminist Peace and Security in Pacific Islands*, September 2020,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056/dp-feminist-peace-security-pacific-islands-210920-en.pdf, 2022-07-30.

③ Claire Slatter, “Neo-Liberalism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Pacific Island Stat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a Global Economic Creed and a Changed Geopolitical Order,” 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153-178.

④ Steven Ratuva,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COVID-19 and Social Solidarity Economy in the Pacific,”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16-22; Henry Ivarature, “COVID-19: Reconfiguring Human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Bulletin*, No.82, 2021, pp. 75-78.

(一)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力量

由于前述各种因素影响,太平洋岛国地区尚未形成完整的国家安全学科。特别是,作为整体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s)组成的,总人口仅 1000 多万的地区,太平洋岛国地区欠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研究所需的人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另外,太平洋岛国地区又面临着独特的安全威胁,产生紧迫的安全研究需求。这种矛盾促使太平洋岛国地区学界必须按照自身情况构建安全研究力量,分散研究与资源整合是两大特点。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力量非常分散。从总量上看,该地区智库数量很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 年全球智库索引报告》统计的全球 11175 家智库中,太平洋岛国地区仅有 7 家,其中,4 家来自斐济、2 家来自巴新、1 家来自萨摩亚。[①] 从国别上看,该地区内部并无明显的科研力量上的领导国家,虽然巴新和斐济高等教育与科研力量比其他岛国相对充裕,但远不能满足需要,更无法与澳、新等国相比。从研究者上看,既有高等学校,也有政府机构和地区组织常设机构(如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还有非政府组织、教会、政治咨询公司等各种主体参与到研究工作中,涉及供职于域内外的太平洋岛国学者,构成非常多元。本文对理论视角和研究议题的文献回顾也体现了这种分散特征。

南太平洋大学是将这些分散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的机构之一。南太平洋大学的组织形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为 12 个太平洋岛国(帕劳和密联邦未加入)共有,其 14 个校区、10 个研究中心分布在 12 个国家,号称“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大学校园”。它具有四重性质: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智库和地区组织。作为高等学校,其 14 个校区和远程教育共有 3 万名学生;作为科研机构,其来自 30 多个域内外国家(包括中国)的 300 多名教职人员在 14 个校区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还设有多种兼职教研职位以利于远程工作,本文引用文献的不少作者来自南太平洋大学;作为智库,它制度性和经常性地向各岛国和地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承担委托研究;最为独特的性质是,南太平洋大学是一个以 12 个岛国为成员国的正式地区组织,是太平洋地区组织理事会(CROP)

① James G. McGu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January 27, 2021,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9&context=think_tanks, 2022-08-12.

成员。[①] 这种既是研究机构又是地区组织的双重性给了南太平洋大学参与地区安全治理以独特优势。例如，南太平洋大学是《博埃宣言》框架下的“太平洋安全对话”机制的正式参与方。

南太平洋大学的治校机制也有利于政策导向。该校校长由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轮流兼任，学校日常工作由执行副校长负责，学校管理委员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由各成员国政府、师生代表、合作方代表、太平洋岛国论坛等主要地区组织代表和美英澳新等主要域外捐助国政府代表组成。一方面，这样的架构使得该校具有天然的政治导向；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南太平洋大学成为扮演研究供给与政策需求两端的桥梁角色。[②] 总之，南太平洋大学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而独特的平台。

另一个将地区组织机构与研究平台合二为一的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该机构的历史可追溯至 1968 年建立的太平洋岛屿种植业秘书处办公室，后者从建立起就既是一个地区组织，也是一个研究机构。《太平洋岛屿种植业通讯》是太平洋岛屿种植业秘书处办公室最早发布的研究产品，其主体、名称与形式几经变更，延续至今。本文中的不少引证文献来自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研究通讯产品。秘书处目前有 20 余名专职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官员、具体领域专家、项目官员、项目专家、数据专员、研究助理等多个岗位，在秘书处政策组和各个项目工作。[③] 这种设置有利于将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与项目实践紧密结合，并直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地区组织与领导人的决策参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还是唯一进入《2020 年全球智库索引报告》排名榜的太平洋岛国地区智库。[④]

---

① Vijay Naidu, “A Commentary on the 50-Year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11-33.

② Vijay Naidu, “A Commentary on the 50-Year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11-33.

③ “Forum Secretariat Staff,” https://www.forumsec.org/latest-forum-secretariat-staff/#1498188023648-124da6cf-14b9, 2022-08-11. 另参见笔者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实地调研与采访，2019 年 5 月 14—16 日，苏瓦。

④ James G. McGu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January 27, 2021,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9&context=think_tanks, 2022-08-12.

(二)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路径与方法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在路径与方法上也具有独特性。

第一,多个学科、多类范式和多种方法并举的路径。从学科上看,既有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研究关联紧密的国际关系等学科,也有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学科交叉特征明显。从范式上看,既有结构主义,也有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也较为多元。南太平洋大学作为重要研究平台,其自身发展历史就是以跨学科综合研究为传统特色。南太平洋大学自建立之初就设有三个跨学科的学院;虽然此后经历了西方影响下的学科化院系改革,改为以聚焦单一学科的系为主要单位,但近年来又出现了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回潮,通过学部、学院、研究中心等正式架构,以及研究协调人、研究项目等多种灵活方式组织多学科、跨学科研究。[①]

第二,研究、政策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推动的路径。"人的安全"视角内在要求安全研究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各种理论视角指导下的研究的最终价值还是要解决这个地区面临的严重安全挑战,形成地区、国家和社区等各层次上的政策与解决方案。在太平洋岛国地区这样一个"小规模熟人社会",学界与政府、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密切互动,加上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等研究平台的设置,客观上也容易将研究成果从学理延伸到政策与实践。而政策与实践反过来为研究提供了样本。

第三,话语文本分析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这既符合安全化理论、后殖民主义和叙事理论等理论视角,也契合这个地区的现实情况。这个地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战争冲突,地区会议与文件制定就是应对该地区安全危机的主要路径。因此,话语叙事作为"武器化的语言"(weaponized words),[②]既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政治现实,也是安全研究的方法。

第四,案例研究也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常见方法。地区层次的

---

① Vijay Naidu, "A Commentary on the 50-Year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pp. 11-33.

② Kurt Braddock, *Weaponized Words: The Strategic Role of Persuasion in 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9.

安全研究既要研究地区整体与共性，也要考虑不同岛国、不同岛屿乃至不同社区的差异。因此，案例研究有助于将地区层次上的讨论落到具体案例上；而因为不同岛国之间面临安全问题的相似性，案例研究也可能产生适用于地区整体的解决方案。

结　　语

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是国外的国家安全研究中的独特组成部分，其独特性集中体现在：第一，研究层次聚焦地区安全；第二，理论视角独具一格，以“人的安全”为统领，多种理论视角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第三，研究议题非常广泛，但以本地区安全治理架构和气候安全为重点；第四，研究力量与路径方法均注重研究与政策相结合，符合该地区的特点。

当然，这些独特性也导致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诸多弱点。在“人的安全”视角下，安全研究的外延扩展到各个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泛化，分散了本就薄弱的研究力量。将很多问题都归因于气候安全，固然有助于提升关注度、占领道义制高点，但也因此欠缺对其他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现实中安全短板的充分聚焦。此外，对整个地区安全问题共性的强调，使得对具体国家的差异化安全问题有所忽视。最后，虽然太平洋岛国本地区的安全研究近年来有了很大进展，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在整体上对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的巨大影响力。

尽管如此，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还是取得了就其规模来说显著的成绩。对其进行梳理总结，有助于丰富对国外安全研究多样性的认知，更深入地理解安全研究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人的安全”研究特别是气候安全研究，为我国与太平洋岛国深化安全合作提供参考，其独特研究路径特别是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也能为我国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带来一些启示。